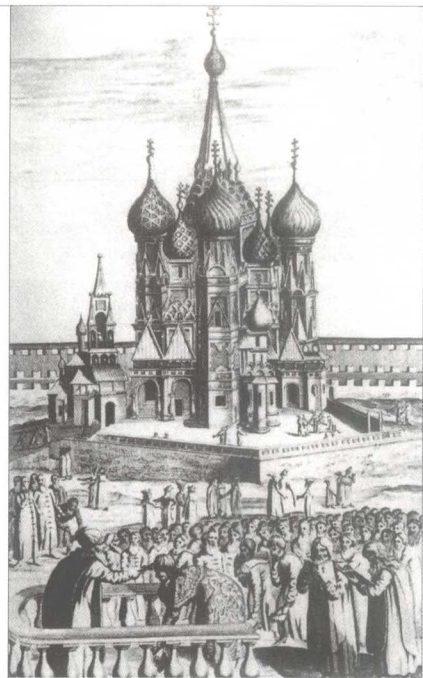


俄罗斯史

(第八版)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著

杨烨 卿文辉 王毅○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俄罗斯史

(第八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史:第8版/(美)梁赞诺夫斯基
(Riasanovsky, N. V.), (美)斯坦伯格
(Steinberg, M. D.)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Russia
ISBN 978-7-208-11586-6

I. ①俄… II. ①梁…②斯…③杨…④卿…⑤王
… III. ①俄罗斯-历史 IV. ①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2012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装帧设计 陈楠

俄罗斯史

(第八版)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 著
杨烨 卿文辉 王毅 主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9.5 插页 4 字数 929,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86-6/K·2004

定价 88.00元

译者序

这本书的翻译是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秘书长杨烨同志受学会的委托,组织几个会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完成的。我名义上是这本书的顾问,但只是通读了全部译稿,提了几点意见,充其量只能算“顾得上就问”的角色。因此由我来做这个译者序实在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实在拗不过这本书的译校者,加上看了译稿以后也有一些想法,就代替译者说几句吧。

读者面前的这本《俄罗斯史》是近年来英语国家教育界、学术界的同类出版物中较有影响、学术水准也较高的教材。作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有近半个世纪从事俄国(包括苏联)通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他终身学习、教授和研究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一个总结。此书的影响可以从其多次再版的事实中略窥一斑。该书的第一版是1962年出的,后来在1968、1976、1983、1992和1999年五次再版。本书所据的原版书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由于原作者年事已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专事近代俄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马克·斯坦伯格成为这个最新版的合作者。通读全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有如下优点和特点。

一是学术性很强。好的教材应当力争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每次再版,作者都根据学术上的最新进展和当代苏联历史的最新事态,做了必要的增补和修正。作者还多次到苏联和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进行考察及学术交流,修订第七版时还利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联和俄国档案。用今天中国流行的一个词来说,作者做到了与时俱进。可以说作者写这本书花了四十多年。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仅仅简单地讲述俄苏历史,重视向学生或读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比如在基辅罗斯的社会性质、蒙古统治的历史评价、莫斯科公国崛起并统一俄罗斯的原因、苏联解体的背景和原因等重大问题上,作者都为读者提供了学术界内部各种有代表性的解释。虽然作者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但其对苏联历史的总体介绍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作者既指出了斯大林体制带有某种专制性

质,同时承认这个制度不仅仅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相当多的苏联人民的真心拥戴,具备一定的合法性。作者在历次写作和修订此书的过程中,还征求了英美两国众多研究俄国和苏联的著名学者的意见,或请他们阅读过书稿,这些人包括迈克尔·卡尔波维奇、伊赛亚·伯林、格列高里·格罗斯曼、理查德·赫尔和理查德·派普斯。熟悉俄苏历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国内同行都知道,他们都是国际知名学者。

第二,在结构上,这本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全书分七大部分,依次分别是导论、基辅罗斯、蒙古统治时期或封建格局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占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体现了适度的厚今薄古。对彼得大帝以前的历史处理得也是详略得当,重要的事件、人物全部涉及了。除远古时期以外,对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每一个部分),除按时间顺序纵论该阶段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外,还设立专章介绍该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历史既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也是在特定的地域里展开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注重地理对历史的影响,此书也不例外。全书以对苏联版图范围内的东欧、中亚和北亚的地理介绍开篇,考虑到地理因素对俄苏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作者的这种安排也是此书的一个亮点吧。

三是文笔优美流畅,深入浅出。这也是许多西方优秀学术作品的一个共同点。译者们在翻译中力图再现原著的文风,效果如何,有待读者的裁判。

当然,书中不少地方也表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知和偏见,这在西方学者中并非少见,相信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学会之所以译介此书,除了此书的上述特点之外,还有如下考虑。迄今为止,虽然在国内出版物中不乏关于俄苏历史的著作,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局限。其中少有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它们大多译自苏联学者的著作,也有少数国内学者的著述。这些著作代表了一定时期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看法,且大都止步于苏联解体前,少有涉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更罕见从远古一直讲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通史著作。西方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看法自有其独特视角,了解他们对俄苏历史的见解,对于丰富、开阔和启迪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国内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头脑,定有裨益。本书不仅从古至今完整再现了俄罗斯的全部历史,而且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最新观点。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关于俄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作为高校教师,多年来我们痛感国内同行编著的不少高校文科教材质量总是不尽如人意。借鉴一下国外的高质量教材,对于推动本土高质量教材的编撰,或许有他山之石的

功效。

俄罗斯和苏联是我们的最大邻国,也是自康熙皇帝以来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了解和研究这个国家,其现实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国人对这个邻居的了解乃至国内学术界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俄苏研究和东欧中亚研究是我们学会的宗旨,这也是学会组织翻译此书的最主要动机。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姜琦

2007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版前言

对一名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俄国通史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毕生的智力和学识的一种陈述。对他人的感激当然是极大的。我至少知道从何处开始我的感恩:我的父亲瓦连京·梁赞诺夫斯基(Valentin A. Riasanovsky)由于参与了本书的撰写,特别是由于他教过我俄国历史,从而对这部《俄罗斯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我必须提及我在哈佛和牛津大学的俄国历史老师,尤其是已故的迈克尔·卡尔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教授、已故的萨姆纳(B. H. Sumner)院长和教授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不少同事阅读了手稿的有关章节并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评论,这里仅提及阅读过本著作大部分篇幅的一些人。我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教授和马丁·玛利亚(Martin Maria)教授,感谢我以前的老师、牛津大学的德米特里·奥博连斯基(Dmitri Obolensky)教授、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查理·耶拉维奇(Charles Jelavich)教授。

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给予了各方面的巨大帮助,还让我自主行事。我也要感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在撰写和出版本书的岁月中,他们是我的研究助手;特别是帕特丽莎·格里姆斯特德夫人(Mrs. Patricia Grimsted)和沃尔特·萨布林斯基先生(Mr. Walter Sablinsky),他们分别在文献目录和索引方面承担了很大责任。我也不能忘怀图书馆和图书馆馆员们,尤其是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及其馆员们。本书的出版可被看作是对我的妻子和我的学生的一种敬意:我的妻子在这一项目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断地和全身心地帮助我;之所以感谢我的学生,是因为《俄罗斯史》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授课而不断完善的,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此书的主要存在理由。

我还想向给我的这本《俄罗斯史》提供具体材料的人表示谢忱。下列出版商允许我从其出版的下述著作中详尽地引述我需要的材料: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所著的《俄国是怎样治理的》(剑桥,1954年),第372—373页。

美国解放委员会出版的《苏联大事记》第二卷第三册,1959年6月。

休伊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乔治·贝雷戴(George Z. F. Bereday)、威廉·布里克曼(William Brickman)和杰拉尔德·里德(Gerald H. Reed)编辑的《变化中的苏联学校教育》(波士顿,1960年),第8—9页。

我还要向兰德公司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表达深切的谢意,因为他们允许我使用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所著的《1928年以来苏俄的实际国民收入》(剑桥,1961年)一书中第210页上的表51。我把这个表压缩为本书的一个附录。伯格森教授本人不仅同意我使用此材料,而且对此及某些相关问题善意地提出了忠告。

下列人士在出借图片材料方面十分慷慨,在此谨致谢意:乔治·汉恩先生(Mr. George Hann)给了我他个人的丰富的圣像画收藏品的复制件;亨利·夏皮罗夫人(Mrs. Henry Shapiro)将她与其丈夫近几年在俄国拍摄的照片借给我;我使用的一些照片是西奥多·冯·劳(Theodore Von Laue)教授于1958年我俩在俄国旅行时拍摄的;马尔维娜·霍夫曼小姐(Miss Marlvin Hoffman)借给我帕夫洛娃(Pavlova)和季亚吉列夫(Diaghilev)的照片;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博物馆允许我复制由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所作的油画《冬》。

正如俄罗斯研究领域中的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知道的,对于专有名词的准确的音译及其在英文中的书写问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依靠国会图书馆系统,但是作了某些修改:值得注意的是,我省略了软音符号,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中用*i*来表示它可能更可取;我用*y*作为姓的结尾。少数姓氏如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姓,我用西方通用的方式拼写,虽然这种做法与本书中采用的音译系统并不一致。至于名字,只要英文中有对应的词,我尽量使用英文词;但对于如伊万(Ivan)这样的众所周知的人名,我则根据其俄文形式直译过来,也在一些其他例子中采用直译的方式,如把别林斯基(Belinsky)的名字拼写成维萨里昂(Vissarion)而不是贝萨里昂(Bessarion)。苏联宇航员的名字则照搬报纸上的拼写方式。我避免用父名^①。一般来说,我尽量利用英文术语和表达形式。我可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我对自己将Kholopy译成“奴隶”并不满意。

用音译的方法为一个国家的通史编制一份适用的文献目录,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我最后决定以音译方式直截了当地将书中提及的学者的主要相关著作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列出。这样做就可以使那些懂得相关语言的有兴趣的读者能够深入探索有关专家的观点,也提供了一个俄国历史文献学的入门。这样一

① 俄罗斯人的姓名由名字、父名和姓三部分组成。如弗拉基米尔(名字)·伊里奇(父名)·乌里扬诺夫(姓)。

份文献目录的主要优点是使用方便。这种做法的主要缺点是它只包含了本书赖以撰写的著作的一小部分,迫不得已地遗漏了一些重要作者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决定仅将两项内容作为附录:一是俄罗斯统治者的世系表,它是了解 18 世纪及其他时期的王位继承情况必不可少的;二是伯格森教授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估计。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62 年 9 月 24 日

梁赞诺夫斯基·尼古拉

1962 年 9 月 24 日

1962 年 9 月 24 日

第二版前言

我撰写的《俄罗斯史》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全部基本内容。尽管如此,时间的推延和学术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大量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有必要将与苏联有关的内容加以扩展,以便能够包容最近的六年并对某些话题予以更多的关注。第二版中提到了不少新的重要作者的名字,因而其著作也收到文献目录中去了。这一领域中尽管还有不少研究人员没有被提及姓名,但其中的有些人对我来说其意义和提到了名字的那些人同样重要。除了正文和文献目录外,地图和插图也做了更改。在附录中,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图表更新了,并增加了苏联行政区划表。此外,第二版附录中新增了一个在俄国历史研究领域内重要的英文著作的目录。

我谨再次对许多人表达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和遍及全美的使用过这本书从而真正地检验了本书价值的所有学生。他们的感受和意见,我已经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不少同行,他们要么在其课程中使用这本《俄罗斯史》,要么阅读了它并作了纠正或评论。尽管不便列出所有适当的人名,但我至少必须提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那个表,他还对整个苏联部分给予了仔细的关注;还有苏联学者维林巴霍夫(V. B. Vilinbakhov),他对我关于俄国早期历史的陈述给予了彻底的和探索性的批评。不用说,在我向这些和其他学者的帮助表达谢意的同时,我必须声明他们无需对我的这本书的任何观点和最后形式负责。我还要感激我的研究助手维多利亚·金夫人(Mrs. Victoria King)和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先生(Vladimir Pavloff),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68年12月19日

第三版前言

《俄罗斯史》第三版不想改变前两版的特色和基本构思。自1968年第二版完成以来,星移斗转,时间的长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1976年的苏共25大和目前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先后带到我们面前。由于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和最近的学术成果,本书内容为此有了不少更改。文献目录特别是英文书目的名单都扩充了。苏联时期所占的篇幅在比例上略有增加,但作者的目标仍然是要提供一本内在比例协调的著作。

许多人应该得到我特别的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再次提供了最新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此外,在用最新材料充实整个苏联部分的努力中他也给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对于我在准备第三版时所全神贯注的那些问题,其他伯克利的同事们也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学识和智慧。其他地方的不少同行们把《俄罗斯史》用作教材,并告知我他们的感受,有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看法,这些都同样使我受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尽心尽职的审核人,诸如维也纳的沃尔特·利奇(Walter Leitsch)教授。杰拉尔德·苏赫先生(Mr. Gerald Surh)和雅各布·皮彻尼先生(Mr. Jacob Picheny)是非常出色的研究助手,他们在所有方面都帮了我,尤其是在英文书目和索引方面。尽管有了这么多帮助,仍有错误和缺陷,考虑到本书的篇幅,错误和缺陷还很可能相当多。这些理应由我个人负责。我将最诚挚的谢意给予我那始终如一的手帮手即我的妻子,还有学生们,这本教科书就是为他们写的,他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布朗大学的一群学生最近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讨论我的《俄罗斯史》,他们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愿他们接受我的谢意,我将他们视为遍及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的代表。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76年3月12日

第四版前言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的逝世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Iurii Vladimirovich Andropov)的迅速继位为这本《俄罗斯史》第四版提供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结尾。本书中的新材料覆盖了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七年。新内容还包括涉及俄国和苏联历史的所有部分的补充和修改,以及对两个文献目录的最新修订。

学术界对我的帮助是全面的、根本性的和令人感激的,因此我要特别向我的同行们,尤其是伯克利的同事们鸣谢,他们为这一版的问世直接做出了贡献。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再次更新了人口统计表和国民生产总值表。此外,基于他对苏联经济和苏联总的情况的无可匹敌的知识,他还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其他帮助。其他同事,如乔治·布雷斯劳(George Breslau)教授,也慷慨地牺牲了他们的时间,给了我大量真正内行的意见。布雷斯劳教授的名著《作为领导人的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苏联政治中权力的建立》刚好在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出版了。在校对、复核、打印、编制索引以及其他方面,我幸运地得到了马契埃伊·塞埃基尔斯基(Mr. Maciej Siekierski)先生和多萝西·香农(Ms. Dorothy Shannon)女士的帮助:前者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手,还提供了有关波兰和立陶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一名出色的秘书。我必须再一次强调我对有恩于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妻子的感激:学生们既热情又不无批评精神地使用这本《俄罗斯史》已经有二十年了;我欠妻子的恩情更深也更长久。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83年9月

第五版前言

在前四版的《俄罗斯史》中,每一次我都是以对当代苏联难题的评论来结束全书的。我曾经写道,苏联既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但是不论是由革命还是因演变所引起的变革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此我无力明确地预测。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结论是,苏维埃制度不大可能再延续下去,不可能通过演变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也不可能被革命所推翻。可以肯定地说,历史有它自己的前进方式,哪怕这意味着将历史学家抛在后面。

在这一评估出版后不久,一个总的来说是善意的甚至有点讨好意味的作者不无愤怒地写道,梁赞诺夫斯基教授不幸地以含糊不清的句子终结了清晰的710页。作为对这位批评者的回应,多年来我就每个版本反复考虑我的结论,但结果是每次都保留了这一结论。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单凭睿智或严谨就能说清的问题,但却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结论。然而,现在我将它从结论部分提到前言里来了。历史学家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被甩在后面了。我的上述评论的第一部分,即苏联的不稳定和不幸,不需要修改或详细阐述。有关变革的困难的第二句话则是前苏联的公民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都在日复一日地体验着的。

说实在话,许多朋友都劝我说,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等几年再出《俄罗斯史》的新版。我之所以不愿等待有两个理由:我一直喜欢撰写当代史,不管“当代”到什么程度,就像我喜欢其他类别的历史一样;牛津大学出版社已为我提供了一位与我共事多年的、极为果断的优秀的编辑。让我们期待下一版的结尾像前面的篇章一样清晰吧(顺便说一句,附录中的表五和表六将在下一版中得到可靠的更新,而在目前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下一版的内容也可能更丰富。“公开性”或许是苏联过去几年来最显著的本质性变化。它确实代表着从极权主义的紧身衣——这是苏联社会和文化的特性——的束缚中的解脱。它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迄今为止,由于时间短暂和其他原因,它尚未触动苏联史学。1990年4月,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重写苏联历史的会议,我阅读了不少苏联出版物,也与苏联历史学家交谈过。通过所有上述努力,我得出的结论是,变革是缓慢的。我不想

贬低诸如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阿尼西莫夫(Evgeny Viktorovich Anisimov)这样的修正派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许因为未来属于他们则更加如此了,但是总的说来我对改革的困难有深刻印象并由此而感到沮丧。那些花费多年心血乃至毕生精力辛勤工作的人总想至少保留一些他们的成果而不是一扫而光,如果说这样做常常是不幸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几年内很可能出现更大胆、更重要的史学成果。

和以前一样,在这一新版的准备过程中,我对整个手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并对1985年之前的苏联历史做了至少57处修正。这些改动有些重要,有些并不那么重要,但都是简要和精确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死亡数字由2000万人提高到2700万人,即增加了700万死者。正文的最后一章当然是新撰写的,而“结束语”也做了很多修改。

同以往一样,我欠了很多人的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和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相识的其他同行们,在那里我度过了1989—1990年的学术年;以及其他地方的美国同行和大量苏联学者及其他苏联来访者。我要特别感谢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本书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处理方面,他再一次提供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帮助,此外,我认为总的来说他是我们的最好的苏联问题专家。我也要感谢南希·莱恩(Nancy Lane)及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感谢我的秘书纳丁·加马奇(Nadine Ghammache);感谢我的研究助手西奥多·威克斯(Theodore Weeks)、小约翰·兰道夫(John W. Randolph, Jr.)和伊利亚·温科维茨基(Ilya Vinkovetsky),他们主要负责修订索引。我还要感谢美国内外对我的这本通史做出持续不断的反响的人们。自美国第四版面世以来,不同的意大利文版本、法文版本已经出现了,在韩国甚至出现了本书俄罗斯帝国部分的韩文盗版(我被告知本书帝国以前部分的韩文版正准备出版)。但是,如往常一样,在流逝的岁月中,我所欠的主要恩情仍来自我的学生和我的妻子。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92年4月)

第六版前言

自上一版《俄罗斯史》面世以来过去的七年证明该国的发展并不像许多专家以及公众舆论所期待的那样确定。俄罗斯仍旧处于转轨之中,而且处于很大的压力和紧张之中。它的经济持续衰退。的确,在1998年8月的金融崩溃中,甚至那些曾经因转轨而一度繁荣的社会集团也蒙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对俄国未来的众多预测不管多么黯淡,都不包括回复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不管好坏,这个国家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俄罗斯联邦时期。即将来临的选举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舞台已经变了。

就如前几版那样,也可能比前几版更突出的是,我尽力跟踪最新事态的发展,这种努力尤其体现在新添的关于“叶利钦(Yeltsin)的俄国”那一章里。我也试图利用俄国档案的开放带来的机会,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伯克利分校的博士们和博士研究生们已经根据这些档案完成了一些最佳的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俄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与许多俄国学者讨论。当他们来到伯克利或参加国际会议或我们的国内会议时,我也与他们作了更多的交流。我还在莫斯科讲过学,有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俄国东道主和对话者。我还要深切地感谢美国同行和帮手。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经济领域提供的帮助依然是无法估量的,他对苏联其他方面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也使我受益。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的其他同事包括罗伯特·米德尔考夫(Robert Middlekauff)、亚历山大·乌辛尼奇(Alexander Vucinich)和雷吉纳德·泽尔尼克(Reginald Zelnik)等教授。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博士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新材料。我的研究助手伊利亚·温科维茨基再一次展示了他对苏联和当代俄国问题的精通,他还修订了索引。纳丁·加马奇女士再一次担当了优秀而热情的秘书。另外,我要就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齐伊娅·史蒂文斯(Gioia Stevens)女士、斯泰西娅·卡米诺斯(Stacie Caminos)女士和本杰明·克拉克(Benjamin Clark)先生所组成的新的“工作团队”为

我所做的及时而有效的工作表示谢忱。我们的女儿玛丽娅(Maria)帮助我处理照片和一些其他事务。对我的妻子阿琳我欠的恩情最多,其理由是有限的篇幅内所难以一一列举的。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99年5月

第七版前言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按新移民的夹杂英俄两种语言的说法就是“光阴如水”。为此,《俄罗斯史》第七版有了两名作者而不再只是一名。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教授于198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现在是厄巴纳—尚佩恩(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曾在那里的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担任过多年主任。斯坦伯格的研究领域集中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俄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然而,像梁赞诺夫斯基一样,他也对俄国的其他时期和其他问题以及比较历史研究感兴趣。这一新合作的成果就是这本经过了重大修改、虽是合著但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书,修改最多的是自1855年到目前为止的内容。两位作者都是活跃的作家,但更是仍活跃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史》第七版仍旧献给我们的学生。

我们谨向我俩所在的两所大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同行表达深切的谢意,尤其是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我们的编辑彼得·考夫奈(Peter Coveney)及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特别要感谢我们各自的妻子,阿琳·梁赞诺夫斯基(Alene Riasanovsky)和简·赫奇斯(Jane Hedges)。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马克·斯坦伯格
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县